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辛 波,刘 浩

(山东工商学院 金融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摘 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它既体现了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又体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过学术界多年的研究,已经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内涵界定、制度障碍、实证研究和改善对策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总的来说,仍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特别是还未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业现代化、经济增长、新型工业化的相关关系进行深入的、细致的探讨。在我国人口红利消耗殆尽,劳动力供给趋紧的大背景下,文章通过对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的综述与展望,以期能构建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度理论体系,实现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稳步推进与持续发展。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29X(2016)04-0026-09

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向前推进,大批的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业转移人口并没有平等的享受发展成果。这一问题的悬而未决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损害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居住证制度、积分入户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相继出台,一方面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制度便利,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规模。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进程中仍面临着较多的制度性、体制性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能有效地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因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加强对该问题的探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据统计^①,截止到2014年,我国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达到7.5亿,城镇化率已高达54.7%。2013年,我国有2.45亿流动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农业转移人口。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为1.9亿,增量为2.0亿。针对上述问题,党和国家高度关注,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步伐。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保证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

修回日期:2016-01-28

基金项目:2015年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东省新型城镇化的溢出效应、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研究”(15CJJ19)。

作者简介:辛波,男,山东烟台人,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刘浩,男,山东东营人,山东工商学院金融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财政学,Email:1246699284@qq.com。

①见《城市规划通讯》2013年第15期的学术动态栏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013《城市蓝皮书》。

证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国内学者不断尝试从各角度、各层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了较多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思路,不断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学者们从制度创新、财政补贴等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体现了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又体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外缺乏相似的制度与现实环境,因此,国外研究较少涉及本课题。与本课题相似的国外研究有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以及移民的本土化、城市化。但是外国缺乏我国独特的转型制度环境,所以限制了其研究的参考价值。

2 概念引入与内涵界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概念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概念界定,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1]:由农村迁往城市,并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户口依然留在农村的人口。农业转移人口是城乡二元经济的集中反映。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盲流”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工”再到现在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同的称谓体现出不同时期整个社会对其认知的差异及态度的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结构固定化,农村担负着为城市提供生活保障的任务,为了使经济可持续运转,必须要控制城市人口数量。因此,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限制甚至禁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步,但在长期内却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加剧了城乡的不平等。改革开放时期,城市工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此时,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开始松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为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其称谓也由“盲流”变成了“农民工”。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对其的定位局限在只是暂时在城市工作,将来还是要回归农村的工人,没有考虑过帮助他们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逐渐认识到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并主张实现发展成果的全民共享。党的十八大用农业转移人口代替了原有的“农民工”,并致力于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具体内涵,不同的学者在观点上略有差异。总的来说,学者们普遍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村户口变为城镇户口,还包括同等的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权利。王桂新等^[1]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含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心理认同五个方面。刘传江等^[2]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界定为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的转变。勋彦辉^[3]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获得市民基本资格、运用市民基本能力、适应城市并具备市民素质的过程。申兵^[4]指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实现职业和社会身份的双重转变和获得城市公共服务。魏后凯等^[5]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包含社会身份转变、政治权力平等、公共服务覆盖、生活条件改善、文化素质提高以及社会认同深化六个方面。姜义平^[6]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狭义是指获得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广义是指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权利等方面实现与市民的同质化。吕炜等^[7]从改革全局、过程视角、中国式转轨逻辑以及渐进路径四个方面阐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丰富内涵。王伟同^[8]阐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民生逻辑、经济逻辑以及改革逻辑,并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改革是一项关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改革,将会对我国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农业转移人口虽然是一个新提法,但在内涵上与过去的“农民工”没有太大的差别。都反映了一群以“职业身份是工人、社会身份是农民、工作在城市、户籍在农村”为特征的产业工人。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笔者认同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将其看作是一个农业转移人口在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素养、思想观念等多个方面实现转变的过程。其中,以经济状况的改变为主导,并且遵循先实现城镇定居再实现政治地位提升、思想观念转变这样由“硬”到“软”的事实逻辑。同时,只有实现了各个方面的转变才能说是实现

了真正意义上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3 制度与体制障碍的研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概念提出以后,有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研究便蓬勃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研究时间较短,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及体制障碍上,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影响及与其他过程的耦合衔接研究较少。

3.1 制度障碍方面

制度障碍在制度层面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这些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并致力于实现和维护城乡二元结构为特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

3.1.1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原有职能是人口的登记与管理。但是,在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相对不足的背景下,户籍制度还附着着提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及就业等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我国过去的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在带动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忽视了公共服务的充分提供,造成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相对稀缺。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农业转移人口定位为廉价劳动的提供者,而不是城市公共服务的享受者。另一方面,出于压低成本的考量,雇主也没有足够的意愿为农业转移人口缴纳社会保险。可以说,在上述博弈过程中,农业转移人口牺牲了本该享有的社会保障,换来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微观主体效益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城市公共服务不但总量不足,而且结构不优。结构不优体现在大城市拥有较好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条件,而小城镇则因公共服务较差而不具有吸引力,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同时,政府的原有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政府插手经济建设的现实也反映了其职能的越位与缺位。

在对于户籍制度的研究中,学术界已就户籍制度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达成共识,现在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户籍制度的改革上。辜胜阻等^[9]在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实施差别化落户以及积分制政策实现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通过居住证制度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维路径”。魏后凯^[10]认为,应按照普惠权利、统一户籍、区别对待、逐步推进的政策思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同时,在具体的政策措施层面,应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建立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清理与居住证挂钩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相关配套制度改革以及建立多元化成本分担体系。傅晨等^[11]研究了广东省实施的农业转移人口积分入户政策,分析了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扩大指标数量、调整指标地区分配、完善计分标准以及开展相关的配套改革的政策建议。王春蕊^[12]分析了广州和上海实施的居住证管理制度,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人才”偏好以及普惠赋权相对保守的问题,最后给出了拓宽赋权范围、完善指标体系等政策建议。崔庆五^[13]研究了成都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存在的改革不彻底、改革的收益范围较小以及资金压力等不足之处。最后,给出了争取财政支持、改善农村医疗等政策建议。吴波^[14]解构了2014年7月30日出台的户籍新政,认为应该遵循“规范有序、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统筹配套”的推进机理,重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路径。在实证层面,孙文凯等^[15]研究了2003-2006年中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结果发现:很少有证据显示制度改革对短期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

3.1.2 农村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制度主要指现行的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以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现行制度规定:农村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在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拥有垄断权。在旧城

镇化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上以征用的方式低价获得土地,在二级市场上通过拍卖的方式高价出让土地。地方政府通过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获得土地后,房地产开发商或高价囤地或高价卖房。而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面临的是低廉的征地补偿,在城市面临的是畸高的房价。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度。可以说,通过土地用途的转变,实现了财富由失地农民向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转移。而失地农民是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的“退出”需求。面临着高昂的市民化成本,农业转移人口仅仅依靠工资性收入很难顺利实现市民化。而农村土地承包权作为农业人口独有的权利,应该为其提供财产性收入。而目前存在的制度变革滞后、市场发育迟缓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从中获利。同时,土地不但是农民的生产资料,更是农民的保障来源。因此,在市民化进程受阻之际,农业转移人口更加重视土地的作用,他们大多将承包地转给亲戚代种或者干脆抛荒,这既损害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同样的,在对于土地制度的研究中,学术界已就土地制度迫切需要改革达成共识。目前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改革农村土地制度。韩立达等^[16]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私人成本进行了研究,指出应转化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从而增加农业转移人口的财产性收入,突破其市民化的私人成本障碍。傅晨等^[17]在对农业人口进行合理分类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农业人口对土地的差异化需求,提出需要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赋予农业转移人口“退出权”。康涌泉^[18]比较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和收益,并指出可以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抵押来解决城市住房资金问题。吴宝华等^[19]指出,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不改变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强化宅基地、承包地的用益物权属性。安虎森等^[20]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该在农村设立退出机制、在城市设立进入机制并在城乡之间设立鼓励转移的激励机制。郑无喧等^[21]提出了在渐进市民化过程中,“带地进城”的过渡性发展策略。其内涵是在保留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承包权、享受土地收益的同时,允许其带地落户,实现市民化。

3.2 体制障碍方面

除了从制度层面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学者们还从体制层面研究如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不合理的制度是其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以及市民化促进体制和成本分担机制的缺失在深层次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顺利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的最主要标志是同等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因此,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本质上是财政问题。财政体制涉及中央与地方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等多个层面。乔俊峰^[22]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阻的根本性体制原因是现行的财政体制无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配置。他认为主要原因是支出责任的地方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能力和意愿以及转移支付制度未能与流动人口挂钩。石智雷等^[23]认为,由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过大造成的市民化成本过高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趋缓。"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课题组^[24]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财政能力以及财政体制两方面的障碍。其中,财政体制障碍主要体现在政绩考核制度以及财政制度设计忽视了农业转移人口。

针对财政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孙红玲等^[25]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财政转移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提出了打破户籍界限,按常住人口“标准人”分配的政策主张。石智雷等^[23]提出建立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改善转移制度结构,重点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倾斜等政策建议。乔俊峰^[22]认为应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建设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地方税体系以及重构地方政绩考核体系。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课题组^[24]提出了分类引导、渐次推进的市民化推进原则以及一系列建立成本分担机制、破除体制障碍的制度建议。寇琳琳^[26]提出应按照“有序引导增量、优先解决存量”的原则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在教育、社保、住房等方面重点投入,提高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以及城市居民等相关利益主体,为构建市民化的促进以及成本分担机制,各利益主体应该进行适当的变革。

赵红等^[27]在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制约因素的基础上,以机制设计理论为指导,从五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涉及法律、宣传、土地各个方面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机制。王琛^[28]从政府、企业、农业转移人口自身三个层面提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并设计了三者之间的利益分享机制。王杰玲^[29]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新变化,在揭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融入、协调推进、创新支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徐世江^[30]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不能顺利实现市民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阐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多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涉及财税、成本分担等各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于传杰^[31]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素质、能力、成本等方面的多维困境,并提出了政府主导、自愿转化、户籍蜕变等七个不同的机制创新,同时在制度层面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杨云善^[32]认为要想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社会五个方面建立融合机制,在不同的机制下,又提出了不同的子机制,共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蔡瑞林等^[33]在构建目标函数的基础上,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以及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取向,并提出了旨在促进市民化的改进指标考核、实现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匹配以及差异化转移支付的政策建议。蔡瑞林等^[34]提出了以农地非农化收益来补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的政策建议,并认为此举是政府获利后对失地农民的反哺。

4 实证研究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也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做了实证分析,主要沿着以下三条路径:一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评价,二是对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的估算,三是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评估。

4.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评价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行评价,有利于找出促进其市民化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上官卉彦等^[35]基于 C-D 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利用 SPSS 计量软件分析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了福州市的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认为福州市的市民化水平整体偏低,并从政府和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两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魏后凯^[5]首先定义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基于计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从政治参与、公共服务、经济生活、综合素质方面对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2011 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仅为 39.56%。王桂新等^[1]以调查问卷的形式,研究了上海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他们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细分为: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以及心理认同这 5 个方面。计算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已经达到 54%。刘传江等^[2]利用 2005 年调查问卷数据实证分析了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认为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最后提出了进行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方面制度创新的建议。周密等^[36]利用沈阳、余姚等地区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 Biprobit 模型测算出两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率为 73%,并提出了增强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的政策建议。勋彦辉^[3]构建了测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率的指标体系,他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应该包括:人口素质、主观认同、行为方式、权利行使以及生活质量,并给出了计算市民化率的具体公式。徐建玲^[37]将市民化进程测度分为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两个维度,从理论层面提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测度方法,具体测算了 2005 年武汉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达

到半市民化状态。张斐^[38]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计算出我国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并认为其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对其市民化水平有显著影响。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我国学者通常采用先具体定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内涵,再利用某地区问卷调查数据或全国数据来评价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同的学者在实证方法选取上存在差异,这些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创新。

4.2 对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的估算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估算,有利于进一步理清各级政府、企业的支出责任,为财税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参考。张华初等^[39]在综述不同成本测算方案的基础上,选取了分类加总法,分项测算了广州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并提出了成本分担的对策建议。张仲芳等^[40]在合理定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内涵的基础上,具体测算出江西省 2014 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为 13984.06 元。李为等^[41]构建了公共成本测算模型,计算得出福建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为 10.22 万元,并构建了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眭海霞等^[42]通过计算得出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总成本为 285760.84 元,并详细区分了政府、企业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各自的分担比例,最后提出了构建成本分担机制的对策建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43]基于全国 6 个城市 6232 名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计算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为 8 万元,并提出了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姚毅等^[44]使用计量方法测算了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以及乐山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并对不同省(市)的公共成本进行了比较,最后构建了在政府、企业以及农业转移人口之间的成本分担机制。张国胜等^[45]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劳动的制度性贬值以及基本权利的缺失。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积累,最后提出了就业、户籍、土地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创新。张继良等^[46]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江苏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为 12.3 万元,同时分类计算了第一代以及第二代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本,苏中、苏南、苏北的市民化成本。

4.3 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评估

对区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评估是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的。评估的结果可以作为决策者参考的依据。宋周等^[47]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实证检验了成都市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各种因素,认为其意愿主要受收入、支出、居住条件的影响,并提出了下一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工作重点。黄勇等^[48]通过大样本调查问卷,从定居意愿、农地权益处理以及期望政策等多个维度实证检验了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为制定政策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姜凯凯等^[49]调研了马鞍山市博望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情况,发现影响小城镇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是房价、年收入等,并提出了小城镇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包括合理规划城镇、控制房价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何一鸣等^[50]在理论模型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广州市农业转移人口问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发现积分入户资格、农地产权以及公共福利三个维度都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水平。黄锬^[51]运用罗杰斯特回归模型以及入户调查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城乡二元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有重要影响。王桂新等^[52]通过定量分析发现,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状况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状况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年龄、婚育状况以及迁入地的经济发达程度也影响其市民化倾向。

5 研究述评与展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范式,拓展了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在当前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会不断走

向深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仍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还存在很大需要完善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一个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学术界只是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行单独研究,忽视了与其他进程的耦合、衔接研究。例如,农业转移人口退出农村后,怎样引导农民走规模化、集约化、生态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道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以后,如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新型工业化的良性互动与同步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转入地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在中央层面,如何协调转入地和转出地之间的财政关系。农业转移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如何与当前的房地产去库存相匹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有多大。中央政府站在全局的高度,如何才能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妥善协调好各方的利益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学术界的后续研究。其次,农业转移人口是一个较为笼统的概念。按流入地可以分为:地级市内部农业转移人口、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以及省外农业转移人口。按是否参与劳动可以分为:劳动力、劳动力家属。按年龄以及市民化意愿可以分为:市民化意愿较弱的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强的新生代农民工。按教育程度,可以分为学历较高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学历较低的农业转移人口。不同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其独特的利益诉求,而目前的研究对这方面的关注较少。学术界依然停留在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宏观总量研究,还没有进入微观分析的阶段。再次,城市也可以按规模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土地、公共资源、人口状况,地方政府如何自主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路径。如何更好地激发中央和地方两个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学者们的后续研究。最后,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上,虽然学者就制度变革提出了诸多建议,但是大多都是在理论层面空谈,对于我国当前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实际而言,缺乏可操作性,实践意义不大。

总之,当前还未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动态演进进行深入的、实质性的研究。在以后的研究中,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其他进程的相互影响、协调运行。以期形成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体系,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 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 人口与发展,2008,14(1):3-23.

[2]刘传江,程建林.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2008,32(5):48-57.

[3]鄢彦辉. 农民市民化程度测量指标体系及评估方法探析[J]. 学习与实践,2009(8):109-112.

[4]申兵.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难点及对策[J]. 中国软科学,2011(2):1-7,15.

[5]魏后凯,苏红键.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2013(5):21-29,126.

[6]姜义平. 失地农民市民化程度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34(4):78-80,90.

[7]吕炜,谢佳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新认知与理论思辨[J]. 财经问题研究,2015(11):3-10.

[8]王伟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逻辑——基于民生、经济与改革的视角[J]. 财政研究,2015(5):39-44.

[9]辜胜阻,李睿,曹誉波.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二维路径选择——以户籍改革为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2014(5):2-10,126.

[10]魏后凯.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路和措施[J]. 中国发展观察,2013(3):15-17.

[11]傅晨,李飞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户籍制度创新探索——广东“农民工积分入户”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2014(3):15-21.

[12]王春蕊. 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居住证管理制度的完善[J]. 中州学刊,2015(6):60-65.

[13]崔庆五. 关于成都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几点思考[J]. 人口与经济,2012(2):60-66.

[14]吴波. 基于户籍新政解构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路径的重构[J]. 华东经济管理,2015,29(3):97-103.

[15]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 户籍制度改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1,46(1):28-41.

- [16]韩立达,谢鑫.变“权”为“利”,突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私人成本障碍[J].理论与改革,2015(1):70-73.
- [17]傅晨,任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机理:一个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4(3):74-83.
- [18]康涌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及收益解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6):116-120.
- [19]吴宝华,张雅光.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7):82-86.
- [20]安虎森,刘军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城镇化[J].甘肃社会科学,2013(3):202-206,244.
- [21]郑无喧,黄耀志.“带地进城”:农业转移人口渐进式市民化对策[J].现代城市研究,2015(1):55-57,68.
- [22]乔俊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受阻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5):38-43.
- [23]石智雷,朱明宝.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28(2):5-10.
- [24]“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课题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财政约束与体制约束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4(5):3-9.
- [25]孙红玲,谭军良.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思考[J].财政研究,2014(8):60-63.
- [26]寇琳琳.推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投入重点[J].财政研究,2014(5):77-79.
- [27]赵红,王新军.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研究——基于机制设计理论[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00-106.
- [28]王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路径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J].科学社会主义,2015(2):89-93.
- [29]王玲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策略与机制创新[J].生态经济,2014,30(10):118-121.
- [30]徐世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2(3):25-32.
- [31]余传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完善及制度创新[J].中州学刊,2014(3):41-46.
- [32]杨云善.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机制研究[J].河南社会科学,2014(2):109-113.
- [33]蔡瑞林,陈万明,张丽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分担的博弈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67-75.
- [34]蔡瑞林,陈万明,朱广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成本分担还是利益反哺?[J].农村经济,2015(1):110-115.
- [35]上官卉彦,伍博炜,曾月娥,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探讨——以福州市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106-112.
- [36]周密,张广胜,黄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90-98.
- [37]徐建玲.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65-70.
- [38]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100-109.
- [39]张华初,罗光容,刘胜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以广州市为例[J].城市问题,2015(6):7-13.
- [40]张仲芳,舒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测算及分担机制——以江西为例[J].江西社会科学,2015,35(9):54-60.
- [41]李为,伍世代.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及分担——以福建为例[J].东南学术,2015(3):154-160.
- [42]睦海霞,陈俊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J].农村经济,2015(2):119-123.
- [4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J].改革,2011,(5):5-29.
- [44]姚毅,明亮.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机制设计[J].财经科学,2015(7):123-131.
- [45]张国胜,陈瑛.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J].经济学家,2013(1):77-84.
- [46]张继良,马洪福.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J].中国农村观察,2015(2):44-56,96.
- [47]宋周,黄敏,李正彪.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成都市为例的分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1(5):66-71.
- [48]黄勇,周世锋,张旭亮,等.浙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和意愿调查[J].浙江社会科学,2014(11):139-146,160.
- [49]姜凯凯,朱喜钢,高焜尘,等.小城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实证研究与政策应对[J].现代城市研究,2015,30(2):60-66.
- [50]何一鸣,罗必良,高少慧.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2014(5):38-48.
- [51]黄崧.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76-81.
- [52]王桂新,胡健.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市民化意愿[J].人口学刊,2015,37(6):45-55.

A Review on Rural Migrant Citizenization Studies

XIN Bo, LIU Hao

(School of Finance,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As a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ral migrant citizenization reflects both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n industrial country an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market economy. Although 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in its connotation definition, institution obstacle, empirical studie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ic theoretical system has not been formed, particularly without a deep study of the co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migrant citize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new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 that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is exhausted and labor supply is tight, the present review and prospect of its rural migrant citizenization studies is expected to be helpful to establishing an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cening rural migrant citizenization.

Keywords: rural migrant; citizenization; research review; prospect

(责任编辑 时明芝)

(上接第 17 页)

- [12] 白洁. 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经验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09(8): 65-69.
- [13] 朱彤, 崔昊.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中国技术进步[J]. 世界经济研究, 2012(10): 60-67.
- [14] 王长义.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5(5): 33-45.
- [15] 魏子东. 山东省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探析[J]. 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4(6): 77-81.

A Study on the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WANG Chang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Taking annual data from 1994 to 2013 as sampl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izes the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effect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scale hollowing-out and efficiency hollowing-out, while the factor costs such as fixed asset price index and producer price index instead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With their slow growth, expor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ve increasingly affected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dustrial hollowing-out; time series

(责任编辑 王明益)

山东省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非均衡发展研究

朱世英

(山东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山东既是经济大省, 又是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改革开放以来, 山东经济发展迅速, 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and 劳动力结构优化, 但是二者在时间和变动幅度上存在不均衡的发展特征。通过对1980-2013年山东省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进行 Granger 因果检验和结构偏离度分析发现: 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加大, 第二、三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依然存在较大的转移改善空间。对此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多种举措增加农业收入, 让懂农业的农民留在农业; 推进工业转型升级, 提高发展质量, 带动优化第二产业劳动力结构; 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 增进城乡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 加强职业教育培训, 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劳动力结构; 非均衡; 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29X(2016)04-0035-09

0 引言

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 主要指构成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关系以及各产业内部的构成比例关系。劳动力结构则是指劳动就业人口分布结构, 即在不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就业人口的比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 产业结构会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处于调整变化中, 这种调整主要是通过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再配置来实现的, 而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配置则是通过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优化分配来实现的。因此, 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二者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关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变动规律, 在国外, 克拉克^[1]提出, 产业结构的演变是以“以农业为主→以工业为主→第三产业为主”为发展方向, 由“一、二、三”结构依次逐渐发展为“三、二、一”结构; 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则是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的前提下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逐步转移。关于二者变动转移的原因, 刘易斯^[2]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城乡收入差异的根源, 诱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关于二者的变动是否同步, 库兹涅茨^[3]指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互动是不完全同步发展的关系。钱纳里和塞尔奎因^[4]指出: 在发达国家中, 产业结构的调整

修回日期: 2016-03-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保障粮食安全视角的土地托管运行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12CJY065);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研究”(10BJGJ09)。

作者简介: 朱世英, 女, 山东莒县人, 山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农村经济理论与政策, Email: sdcjzsy@163.com。